



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谢希德校长与美研中心(下)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成立于1985年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迎来了四十华诞。

尽管我实际只参与了美研中心的筹建和中心成立后最初一段时间的工作，但经历的许多事已成为我日后人生和事业的宝贵印记。

“研究美国，是美研中心的重心”

在筹备美研中心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对美研中心的工作重心、担当角色、发展方向等提出了建议，并列出来一长串的研究课题，偏多的是希望美研中心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发挥更多的、直接的作用。谢校长为此专门与多位中美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听取意见。其中有几次与到访上海的北京大学袁明老师、社科院的李慎之先生、资中筠先生和陶文钊老师，以及美国的鲍勃·斯卡拉皮诺、麦克·奥克森伯格、哈里·哈丁和以后的包道格、兰普顿等。一条清晰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延伸，美国的国内政治决定着对华政策的走向，搞清楚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走向，是研究把握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美研中心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汪道涵市长进一步提出，美研中心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努力高水平、高质量地参与研究重大问题，以此来培养高水平的队伍。中心要尽快组织集合并培养一批有综合能力的专职和兼职的专门人才，出一批研究美国问题的专著，每年开几个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有几个专事政策分析的高手，使得我们对形势和政策的分析判断更有现实性、针对性和战略性。汪市长和谢校长实际上已经为美研中心勾勒出了一个现在意义上“智库”的雏形，这也是美研中心这四十年来不懈的努力方向和取得的成就。

其中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汪熙先生为美研中心初期建设所作的贡献。汪先生早年在美国常青藤学校学习毕业后，他的家境和他自己的能力完全有条件留在美国，但他和夫人董幼娴（中国民主建国会创会成员之一，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至第九届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员会常委、副主委、名誉副主任委员等）一起，在新中国成立时毅然回国在大学任教。他和汪市长是同乡，在汪市长听取他意见时，他表示完全赞成汪市长和谢校长的战略决策，在协助谢校长筹集美研中心的同时，将努力为中心做好三件事：1. 带一批专事美国研究的博士生；2. 出版3-5个系列的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丛书、专著；3. 策划筹备与美国知名学术机构合作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

此时的汪熙先生已年近七十。在他生命最后近三十年的时



■ 1987年，参加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老办公楼落成典礼人员合影

间里，日夜耕耘，奋力与时间、与疾患拼搏，取得了令比他年轻的学者都难以企及的成就；他与其说为复旦，不如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独担一方重任的事业骨干，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从1985年至2013年，他主持出版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25辑），收录了中美两国学者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优秀作品，成为当年美研中心学术研究成果的“压舱石”，对几代学人的成长功不可没。他配合谢校长在中美两地召开的多个国际会议，成为中美双方都高度认同的学术交流平台，有效提升了美研中心的学术水平，扩大了美研中心的影响。

另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关我的研究方向和博士论文的选题。

有一次向汪市长汇报美研中心工作，我在一旁负责做谈话记录。当时，汪市长正兼任着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会长，谈话时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中美在已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能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将美台关系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我感觉在场大多数的同事都不太说得清楚，而我当时更是汗颜之极，完全不知其所以然。汪熙先生说，这不仅与中美关系有关，也与美国国会特殊的制度有关。谢校长当即提出，要在美研中心设立一个专门研究美国国会的项目。九二年，谢校长为我争取到一个去美国做专题研究的机会，要我就研究方向提个方案，并听取导师汪熙先生和汪市长的意见。我当时很清楚谢校长和汪先生的用意，于是比较勉强地选题为：“《台湾关系法》与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但内心其实更希望选一个自己熟悉一些的领域。汪先生明确要求要将研究重心放到美国国会研究上去。思考许久后，汪先生将我的研究课题改成了“《台湾关系法》通过前后的台湾游说——美国国会的利益集团、

游说和决策”。汪先生还告诉我，他查到美国有一本教科书，书名就是 *American Congressional Politics: Interest Group, Lobby, and Policy Making*，已托在美国的朋友去买了，其中有一些翔实的案例，行前要好好看一下。汪市长和谢校长都同意这个方案，并表示为确保项目申请成功，他们三人将都为我写推荐信。汪市长进一步说，题目可以先这么定，但重心不仅要研究这个《法》是如何通过的，而且要研究清楚美国国会的立法制度……很遗憾因当时工作的需要，在我完成研究计划之前就不得不提前回国了。但这依然是我终身的研究课题。

在服务中美关系大局中发挥作用

美研中心在谢校长的带领下，很快成为学校交叉学科聚集研究重大问题的中心、复旦大学的外宾接待中心、国际会议和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心。在我离开复旦，到上海市外办工作的期间，正值中美关系一方面跌宕起伏、经历风风雨雨，同时又是中美交流与合作快速发展的时期。美研中心常常是我应对各类棘手、复杂访问团的能够“保底”的宝地。久而久之，美研中心就成了应对中美关系中“疑难杂症”的“专业户”。特别是在有关“人权”、最惠国待遇、“南海撞机”和“南斯拉夫炸馆”、加入世贸等重大或突发事件发生后，美研中心对相关的接待任务，几乎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重要的团组谢校长还多次带病亲自会见客人，据理力争，做解疑释惑、求同存异的工作。由此在各类外宾中留下了学术水平高，说服力强，有包容性、热情友好的口碑，在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做法和优势，在服务国家大局、促进对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其中，有两件事是必须被提及的。

1998年6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对上海进行了访问。当时我正好在上海市外办工作，担任接待克林顿总统访沪的前线总指挥。在与美方先遣队协商日程安排时，美方提出要安排总统与上海的教育、文化、司法、宗教界知名人士见面，并就“构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个主题进行交流的座谈会，这是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的重头戏，是国内外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活动之一。在这十多次的发言、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活动中，有两件事被永久地载入了史册：

一是在美方提出座谈会方案后，我提出了中方参会者名单，并提出中方也出一位知名人士与总统共同主持座谈会的建议。在中美双方都同意了这个方案后，我随即找谢校长商量，请她以复旦大学前校长、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与克林顿总统共同主持座谈会，并就准备进行座谈的内容进行讨论。谢校长完全知道这个角色的分量，但还是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个安排。在座谈会上，谢校长与总统配合默契、别具一格的主持风格和出色的问词答词，优美的英语和温和透亮的声音，给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夫人及在场的中外媒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希拉里在多个场合都充满敬意地高度评价了谢校长的讲话和评论，称是访问上海留下印象最深、最成功的一场活动之一。

而这场活动另一件被载入史册的事，也同参加活动的美研中心另一位老师吴心伯有关。

当年克林顿访华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依然是台湾问题。在北京期间，江泽民主席亲自在多个场合做克林顿的工作，外交部也就相关问题与美方交换了意见，美方领导人为此就台湾问题向江主席做出了明确的承诺，并赞成中美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是中方重大的外交成就，也是克林顿访华的重要成果。但美方就台湾问题所作的承诺在媒体和国际社会面前一直躲躲闪闪，没有作公开的表述。

复旦大学的美研中心是唯一有两个代表参加座谈会的机构。吴心伯既是复旦大学美研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是上海青年学者的代表，是参会者中与总统对话最年轻的。轮到他发言时，他用非常平和的口气问了克林顿总统一个几乎令所有人都没有料及的“会议主题”以外的问题：

“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取决于美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总统先生，您将如何处理台湾问题？”

可以看出克林顿总统对在这个场合回答这类问题并无准备，但似乎已难以回避。他停顿了一下，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作了如下表述：

“美国政府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当时在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立刻拉着我的手几乎是以大步流星的速度冲出会场，确认了克林顿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后，兴奋地说，马上向北京报告！而中外媒体也竞相报道了这一总统座谈会的头条新闻。

这就是日后被外界描述为美国对台的“三不政策”。尽管我们很清楚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经常说一套做一套，但这毕竟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宣示，是美方执行对华政策的重要遵循。

我后来问美先遣队长，这个情节是不是预先有预案的。他含蓄地答复说：据他所知，总统关注的都是座谈主题所涉及的内容，没有计划谈台湾问题。但能看出来的是，这次访问对他的对华认知改变许多，这也许就是他的变化吧。

“一个如此重大又不太愿意公开说出来的政策宣示，被复旦大学一个青年教师的提问逼出来了！”这个不能上媒体，但却被口口相传的故事迅速传播开来！复旦美研中心由此在海内外引起了更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美研中心的声音和美研中心的代表出现在中美各个重要对话交流场合。

四十年后的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也凸显着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

中美关系是回不去了。

但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何相处，大概是每一个关注或每一个事关中美关系、事关世界未来的人所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

衷心感谢美研中心的每一个新老同事为实现美研中心初创者的理想和蓝图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衷心期待美研中心取得更大的成就、作出更大的贡献！

（谨以此文寄托对谢希德校长、汪道涵市长、林克书记、汪熙先生等美研中心老领导的深深的怀念，也以此向为筹建美研中心做出过难以替代贡献的卢义民、陈维良、彭瑞寅、周敦仁、倪世雄等老师致以敬意。）

周明伟（曾任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1980年9月—1996年3月在复旦大学学习和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外事处副处长，校长助理兼校办主任、校办主任。）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